

冯至与基督教浪漫主义

李 枫

本文以冯至诗作为例，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折射出的基督教浪漫主义思潮。本文认为：情感与想象力是连接二者的桥梁；独特的抒情风格与气质使冯至诗作与基督教浪漫主义话语产生了若隐若现的关联。由这样的一种关联，能够回溯至欧洲浪漫主义诗人与神学家们在构建“诗化神学”时的一些追寻与思考，本文据此提出：神学不必局限于高堂讲章，神学完全可以诗意之思去开启新的存在方式。

关键词：冯至 基督教浪漫主义 “诗化神学”

作者：李枫，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科学”与“民主”等外来词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语汇，与之相伴的科学民主思潮对社会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但科学与民主不能解决人们在建立心灵的终极价值时遇到的诸多问题，难以满足人的信仰追求。因为，“科学是有用的，但唯其有用，它更多地表现在技术操作层面，民主也是有益的，但民主是一种制度而不是目标，人尤其是文化人的内心世界需要更深层次的生存意义来填充，需要更玄虚的人生价值来实现，也更需要有一种脱离了具体实用的平静心境来支撑。”^①那么，应该如何？又能够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意义、价值与心境呢？本文尝试以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②，并且“这种荣誉一直可以保留到今天”^③的冯至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以及《十四行集》等三部诗集中的代表性作品为范例，考察“堪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全盛期”^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浪漫主义的关联，以期探讨上述问题提供思路。

一、情感与想象力：连接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浪漫主义的桥梁

源自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基督教思想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已成为一种世界

-
- ① 葛兆光：《难得舍去，也难得归依：现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困境》，载《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载吴子敏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0页。
- ③ 谢冕：《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45-47页。
- ④ 王嘉良：《论五四浪漫文学的生成机制与形态类型》，载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第64-69页。

性宗教文化,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文化的形态特色和发展走向,而且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与许多民族的文化发生了交融互渗的关联。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与融合亦即其中一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文学,在直接承传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带有十分明显的西方基督教浪漫主义的色彩,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浪漫主义,对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五四”时期,之所以出现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发展,足以与当时的另一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构成双峰并峙、蔚为壮观的局面,正是由于“外来文学思潮的引入,促使人们从思潮的意义上认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才得以整体性地移入中国,新文学作家方能将文学表现‘浪漫主义’由自在状态转入自觉状态。”^①换言之,“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全盛期的出现,正是源自于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那时较为全面深入地引入中国,并与中国古已有之,颇具充沛的想象、奔放的热情、奇崛的笔致之品格的浪漫文学传统交汇融合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了创造社、浅草社、沉钟社及前期新月社等颇具声势的浪漫文学创作团体,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也“呈整体推出态势,几乎覆盖了各个文体领域,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各种文体均有较为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这在后来的文学发展阶段也很难见到。”^②我们从当时一批目光敏锐的新文学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等人的作品中,能够看出这些作家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思维方式的认同,以及对这一思潮理论的较为深入的认知。如: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撷取的“异域营养”,主要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纯艺术”思潮,创作出了代表作《女神》,郁达夫在《沉沦》中所表现的对卢梭的忏悔和自我暴露的欣赏,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体悟其特色:基督教浪漫主义之所以能够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潜入那一时代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既是由于其被历史潮流所裹挟,同时也因其迎合了那一时期的时代呼唤,由此反映出了那些因传统价值信仰体系的“天崩地裂”而身心紧张、上下求索,寻求能够使精神有所依托的“新的故乡”的先驱者们的诉求。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与基督教浪漫主义产生关联,情感与想象力是其重要的内在动因,是这内在动因搭建了连接二者的桥梁。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现今文学是趋于浪漫主义的”,因为“新文学运动是推崇情感轻视理性的”,“新文学运动所采取的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新文学运动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③而“重情感轻理性”、“注重想象力”、“崇尚大自然”、“渴慕无限美”等也正是基督教浪漫主义所具有的特征^④。情感与想象力,如同纽带与彩虹,在人们崇尚大自然,渴慕无限美的心灵追求之中,将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浪漫主义密切相连。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情感大解放的壮观景象。被封建道德伦理压抑许久的个体情感洪流,终于在自我意识觉醒的“五四”时期找到了喷发出来的突破口,“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⑤这一点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吸纳具有“重情感而轻理性”的基督教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而中华传统文化原本就是一种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的文化,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浪漫主义原本就有的共

①② 王嘉良:《论五四浪漫文学的生成机制与形态类型》,载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第64-69页。

③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见梁实秋《浪漫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④ 李枫:《诗人的神学》第67-75页。本文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基督教浪漫主义亦即浪漫主义神学。

⑤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见梁实秋《浪漫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诸多文学作品与作家中，冯至的基督教浪漫主义情怀及诗人气质就孕育并形成于这种“情感”大解放，想象力空前丰富的时代氛围之中。

二、“抒情”：冯至诗作与基督教浪漫主义话语的关联

1905年，冯至出生于河北涿州一个衰落却依然重视子女教育的盐商家庭。他9岁时生母去世；17岁时继母病故，两次丧母使他受到沉重的情感打击。年少失母引起的凄寂悲苦、由于败落而笼罩在家庭上空的阴霾及难堪，使他很早就感受到了世事无常的凄风苦雨，学会了细腻地体察人情世故。但与此同时，冯家尊重知识的家族传统、代代有人读诗书的文化氛围，也给了他长期的影响，使他较早就能够沉浸在自己的启蒙课本《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以及《古文释义》等诗书之中，以书为伴^①。冯至由此而具有了孤独胆小、忧郁落寂、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养成了沉浸于灵性世界、以赋予了真挚情感与丰富想象力的宗教性沉思来探索心灵困境，以文字朴素的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的特殊气质。所以，他的诗往往能够超越现实世界，在极平凡的事物之中见出其独特的思想。

以冯至所发表的第一首诗《绿衣人》为例：

“一个绿衣邮夫，
低着头儿走路；
——也有时看着路旁。
他的面貌很平常，
大半安于他的生活，
不带着一点悲伤。
谁来注意他，
日日的来来往往！
但，他小小手里，
拿了些梦中人的命运。
当他正在敲这个人的门，
谁又留神或想——
“这个人可怕的时候到了！”^②

在这首诗中，当时还不满十六岁的诗人冯至表达了他看不到前途与光明的迷惘，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最初直觉与恐惧，由此而抒发了他内心深处孤独与忧伤的情感。多年之后，诗人在一部文集的后记中提到了这首诗的写作经过：

“远在1921年，我是一个没有满十六岁的青年，从一个四年制的中学毕业了业，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看不清面前的道路。那时的北京城是一片灰色，街头巷尾，到处是贫苦的形象和悲痛的声音，我们爱说当时青年们口头上的一句话：‘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傍晚时刻，我常在一条又一条的胡同里散步。在这些胡同走来走去，好像永久走不完，胡同里家家狭窄的黑门都紧紧地关闭着，不知里边隐藏着什么样的生活，只觉得门内门外同样死一般的沉寂。

一天，我又在散步，对面走来一个邮务员，穿着一身绿色的制服，他的面貌是平静的，

① 参见：蒋勤国著《冯至传略》，载《晋阳学刊》1989年第9期第35-43页。

② 原载冯至著《昨日之歌》，1927年4月，北新书局，转引自冯至著《冯至代表作》，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页。

和这沉寂的街道一样平静，他手里握着一束信，有时把信投入几家紧紧关闭的门缝里。我看着这个景象，脑里起了幻想，我想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天灾，就是兵祸，这信会使那些收信的人家起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写诗，是这样开始的。”^①

那时，在街头巷尾“一片灰色”的北京城里，诗人耳闻目睹全是“贫苦的形象和悲痛的声音”，于是写出了处女作《绿衣人》，所传达出的是自己对命运无常，世事多舛的切身体验以及发自内心的担忧与叹息。

生命体验与内心深处一种忧郁情感的抒发是冯至早期诗作的隐性主题与基调。冯至从生母与继母这两位母亲的早逝中体悟到了生死的无常，从家道的艰难与国势的倾颓中体会到了人世的多艰，这种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可以说植入了诗人的心底，渗入到了诗人的骨髓之中。所以在他见到绿衣邮差时，总担心他送来什么坏消息，因而产生了诗中“这个人可怕的时候到了！”那样的恐惧与担忧。这首诗正是绿衣人送信这一特定事件与诗人的内心感受相互契合、碰撞的产物，准确地表达了诗人早年感伤甚至有些灰暗的心态，也体现了其“用浓重的色彩和阴影来表达一种沉郁的气氛，使人读后长久为这种气氛所萦绕”的特长^②。

“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可以说是冯至那一代人青年时代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而胡同里紧闭着的“狭窄的黑门”，以及那街道上胡同中门里门外同样的“死一般的沉寂”等一些日常生活画面中的真实情景，则暗喻由“天灾”与“兵祸”带来的苦难，虽具有象征意义却也绝非虚构。由此可以说：冯至先生的第一首诗对生命体验的传达及与之相应的情感表述，预示了其此后诗歌与生命体验的密切关联，也奠定了其沉重浓郁的抒情风格的基础。

有了这样源自于生命体验的情感基础，冯至在1921年夏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德语，接触德语诗歌，阅读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之后，开始对荷尔德林、海涅这样“身世有难言之痛”的诗人产生了同情，觉得充满神秘色彩的德国浪漫派文学能丰富他“空洞的幻想”，并由此而专门研习德国“狂飚突进后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③。

冯至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由于学习德语，读到德国浪漫派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尤其是民歌体的诗歌，大都文字简洁，语调自然，对于初学德语的读者困难较少，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内容和情调能丰富我空洞的幻想。例如诺瓦利斯小说中的“蓝花”象征着无休止的渴望，蒂克童话中“森林的寂寞”给树林涂上一层淡淡的神秘色彩，不少叙事谣曲（包括歌德从民歌里加工改写的《魔王》和《渔夫》蕴蓄着自然界不可抗拒的“魔力”），……莱瑙提出“世界悲苦”的惊人口号。”^④

由此，冯至的早期诗作“无论是在情调、意境上还是在格律上都确实与德语浪漫主义诗歌尤其是海涅的抒情诗有着许多相似相近之处。这样的相似相近，绝大多数只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只是自然而然的共鸣，不一定是有意意识的模仿学习，所以也就不显得生硬，……”^⑤ 虽不大容易一对一地进行对比，却也能够凸显其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抒情气质，以发表于1923年的《归乡·7·祈祷》之片段为例：

神啊！你笑拈着的花儿，

① 《西郊集》后记，《冯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卷，第131-132页。

② 何其芳语，转引自蒋勤国著《冯至传略》第36页。

③ 《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冯至全集》第5卷，第195页。

④ 同上，第196页。

⑤ 参见杨武能的《冯至与德语诗歌》，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第89-96页。张宽：《试论冯至诗作的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载《香格里拉围城：张宽自选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我怀里仿佛有了一朵！
它正在慢慢开放，——
我心儿是怎样的
一种温暖难言的微痛啊！

.....

天天唱着歌儿，
唱到灵魂颓丧了：

.....

神啊！这是件罪过吗？
神啊！假如这都是罪过，
我就要向你乞求了！
请你多给我一些智慧；

.....

使这花儿好好地开
好好地谢呀！①

这里，由在“我”怀里慢慢开放着，而由神“笑拈着的花儿”这样的意象，由心儿“温暖难言的微痛”，以及天天唱着歌儿，一直“唱到灵魂颓丧”的话语模式，我们不难想起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的名言：浪漫主义正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这朵花绝不难看，只是鬼气森然，看它一眼甚至会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引起一阵恐怖的快感，就像是从痛苦中滋生出来的那种痉挛性的甘美的感觉似的。在这点上，这朵花正是基督教最合适的象征，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②另一方面，“神啊！这是件罪过吗？”“假如这都是罪过，我就要向你乞求了！”这样的自责与祈求，又向我们提示着《圣经》中的警句格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③我们知道，所谓“上帝的荣誉”在《圣经》中是一个技术性词语，“意指上帝对人揭示他自身。具体而言就是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启示。”④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⑤而《圣经》中关于“罪”的概念则又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标准提出来的，根据这样的标准，“人的怒气和淫念与杀人及犯奸淫同样是罪。但圣经对罪的理解却不仅限于人在行为或意念上犯罪，更根本性的是，圣经认为人的罪是人在本性上对上帝的悖逆与反叛。也就是说，人内在地有一种偏离正轨，该做不做，明知故犯的顽固反叛上帝的倾向。罪包括了人的行为，意念及整个存有。从这意义上来说，世人不仅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人更是因为是罪人所以犯罪。”⑥由诗人冯至扪心自问式的关于人之“罪过”的自责与祈求，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与具有基督教思想文化背景的德国浪漫派诗人自然而然的“共鸣”。

在1927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中的《北游》组诗中的《中秋》、《礼拜堂》，以及《遇》、《暮春的花园》、《艰难的工作》等诗篇中，也能够读出渗透于字里行间的这种基督教话语模式及相关意象。

① 《冯至全集》，第1卷，第263-265页。

② 海涅：《论浪漫派》，第5页。

③ 《圣经·罗马书》（3：23）

④ 许志伟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⑤ 《圣经·哥林多后书》（4：6）。

⑥ 《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第152页。

以《北游·7·中秋》之片段为例：

“中秋节的夜里，家家都充满了欢喜，
到处是麻雀牌的声息，
男的呼号，女的嬉笑，
大屋小室都是恶劣的烟气；

.....

我含笑无语地离开了这座宴席——

.....

我望着明月迟迟自语，
我到底要往那里走去？

.....

我像是一个溺在水里的儿童，
心知这一番再也不能望见母亲，
随波逐流地，意识还不曾消去
还能隐隐望见岸上的乡村——
在那浓绿的林中，
曾经期待过妖美的花精，

.....

我只是想就这样地在江心沉下，
像那天边不知名的一个流星，

.....”^①

这里，由“男的呼号，女的嬉笑”、“恶劣的烟气”、“心知这一番再也不能望见母亲”的“溺在水里的儿童”，以及岸上乡村那“浓绿的林中”被期待着的“妖美的花精”等话语及意象，我们能够联想起蒂克童话中那“具有神秘色彩的森林的寂寞”，以及莱瑙提出“世界悲苦”的惊人口号。一方面诗人冯至面对着“世界的悲苦”和个人“森林的寂寞”，并没有放弃象征着理想与幸福的“花儿”的期待与向往，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深处也依然充满了凄苦与悲哀，此时的他依然难以摆脱生母和继母相继去世的阴影，他把死亡当作一种悲惨命运的解脱，亦即所谓“脱离苦海”来看待。而这样的思想观点在其第一部诗集中就已有表述，比如，在《最后之歌》中，诗人这样回忆“母亲临终的祷告”：

“记起母亲临终的祷告，
是一曲最后的“生命之歌”
那正是暮春的一晚，
另样的光辉漾着她的病脸；
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
仿佛是宇宙啊，没有明朝——

.....

这时我充满了“最后”的情怀，
秋天的雨冷，冬夜的风悲！
镜中的我的面庞，
却没有另样的光辉；

^① 冯至著《冯至代表作·十四行集》，第49-51页。

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
 仿佛是宇宙啊，没有明朝——
 这时我像是上帝的罪人
 临行时也听不见圣灵的呼叫！

 我却凄凄地无依无靠，

 在母亲祈祷的床边，
 牧师朗诵古哲的诗篇，
 他说母亲是一朵洁白的
 洁白的花朵，开在上帝的花园。
”^①

母亲即将离世，于是有了“临终祷告”，神应许了母亲，让牧师来到母亲身边，引领母亲回到上帝身边，做一朵洁白的花朵，开在上帝的花园。母亲由此将能够克服肉体的软弱和有限，进入新天新地，获得永生，永远快乐；母亲再不会遭遇疾病、苦难和死亡，母亲由此而看到了希望，得到了依靠，于是有了“另样的光辉漾着她的病脸”。正如《圣经》所言：“这义人被收去是脱离了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坟里安歇”。^②而“我”呢？却不得不留在这“没有明朝”的人世间，“凄凄地无依无靠”，继续忍受着雨冷风悲。

综上所述，冯至的抒情中蕴涵着由于受到德语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具有的基督教浪漫主义的思想情怀，蕴涵着对能够使人身心有所皈依的“上帝的花园”的寻觅。因此，他的抒情“不是在自身的生活之外寻求美的消遣，而是从自己存在的最内在的困境出发的深刻独白”。^③冯至的诗作由此构成了与基督教浪漫主义的话语之间若隐若现的关联。谢冕先生曾经指出：“冯先生的诗之所以能够得到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新文化界毫无异议的高度评价是有原因的。……冯至先生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姿态、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出现在中国诗坛。他的诗没有初期白话诗那种语言空疏结构散漫的毛病，意象的密集、诗句的锤炼、章法的谨严，都造出了当日中国诗界的新生面。”^④

冯至的代表性诗作以沉重浓郁的抒情风格与引人超越的“形而上之思”交互交织的宗教韵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其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昭示了基督教浪漫主义对当时中国文学的影响。

三、“沉思的诗”：凝聚了由小我通往“大的宇宙”的思想力量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当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遍地硝烟以及由于物质匮乏而出现的经商狂潮之中，“出现了相对宁静的校园里对精神的坚守，成为园内人极为珍惜、园外人十分向往的精神家园（圣地），就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中培育出了一批战乱中的校园诗人，

① 原载冯至著《昨日之歌》，1927年4月，北新书局，转引自《冯至代表作》，第22-24页。

② 《圣经·以赛亚书》（57：2）

③ 吴允淑：《冯至诗作中的基督教因素》，载赵林、杨熙楠主编《人神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339页。

④ 谢冕：《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45-47页。

并以其特殊的风貌,给这一时期的诗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对以后的新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①当时,北平、上海、武汉、天津的高校因战争逼近而纷纷撤出,陆续集中到遥远的西南一角昆明。冯至也于1938年12月随上海同济大学的队伍迁到了昆明,并于1939年辗转来到了大后方的最高学府,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当时,现代新诗的著名诗人朱自清、闻一多等都汇合在这里,在他们周围,还聚集着穆旦、王佐良等一批热情、敏感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新诗派”的佼佼者,直到世纪末的诗坛还余音缭绕。历史(战争)的机遇把中国新诗史上的主要代表集中于这简陋而丰富、狭小而广阔的天地里,中国成名的、未成名的,已经成型的、尚未成型的诗人,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之道路上难得的“沉潜”状态。这些在战争中经历了外在人生与内在灵魂的反复、激荡、大起大落的年轻人(以及老师辈的中年人)的诗歌观念发生了变化:“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②他们由此而开始了对“思”与“诗”的融合的追求,正是在这样一批诗人对“诗与思”的融合的追求之中,产生了中国新诗史上并不多见的“沉思的诗”。

“沉思的诗”以直面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分裂)为主要特点与追求,同时“将这种现实与灵魂的逼视上升为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是普遍、超越的人类经验和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同时又通过对现代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③冯至是最早实现这样的诗歌理想,并且显示出了鲜明个性特征的诗人。其代表作是他在《北游及其他》之后沉寂了十年而写出的《十四行集》。

由27首诗歌组成的《十四行集》的诞生标志着冯至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从而抵达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④在这部诗集中,冯至由侧重于以传统的浪漫文学的抒情风格来表现个人内心孤苦忧伤的悲观情绪,转而专注于以变体的十四行诗的形式,以其所特有的深沉的思索和冷静的抒情方式,来揭示个体生命之中蕴含着的诗意、哲理以及神性之思。同样是从身边的日常生活与自然中发现的内在哲理,在冯至这里,真正成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冯至的诗因此被认为是在“吐露内心情感”,“是属于个人的诗。”^⑤是“赤裸裸地脱去文化衣裳,用原始的眼光来看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在这部诗集中,冯至以厚积薄发的气势尝试着“突破现实框架,以纯然与自我的‘狭窄的心’,透过巨视与宏观的思想,由小我通往‘大的宇宙’,以臻至生命广远与永恒存在。”^⑥《十四行集》由此而具有了个体的独创性。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个体独创性”,这部诗集才会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⑦也因此而将沉思默想中的诗意想象与诗意领悟发挥到了极致。

与前两部诗集相比较,《十四行集》远为沉静庄严,前两部诗集中的感伤与哭诉更多地转化为了沉思与静观。这样的转化是作者在其前两部诗集中的探索与追求的升华,也是其人生境界与生活体验得以拓展的结果。然而,这部诗集虽然被称为“沉思的诗”,但“沉思不等于哲学,说

①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445页。

② 袁可嘉:《诗与民主》,载《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

③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446页。

④ 参见杨武能:《冯至与德语诗歌》,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第89-96页。

⑤ 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转引自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⑥ 罗门:《诗人冯至的〈十四行集〉——一部唤醒人类对生命省思的启示录》,参见:冯姚平编《冯至与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⑦ 王泽龙:《冯至的〈十四行诗〉》,载《中国现代主义思潮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47页。

是沉思，还是比较接近，说是哲学，我总觉得还够不上。”冯至本人对当时的评论界的这一回应，听起来是自谦，仔细分析却也是在廓清诗歌与哲学的界限，因为“实际上诗与哲学终究还是有别的。……诗应该永不脱离人的感性的感受、情感的领域，给处于寒冷的世界中的人以温暖、安慰、柔情，给处于生存的迷茫中的个体提供一个充满激动人心的温暖的心境。”^①事实上，“提供一个充满激动人心的温暖的心境”也是基督宗教之“圣爱精神”的立意与指归。冯至早期的诗作始终流露着对这样一种温暖的心境、圣洁的爱的期待与向往，《十四行集·22·深夜又是深山》中对于“回到母胎”的祈求，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冯至人生境界与生活体验的升华与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德语文化所具有的神性基础的影响，得益于其在海德堡大学的学习，得益于诺瓦利斯“诗意”心灵之力量的影响，以及里克尔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于人生与存在的思考所给予的导引与启示。

冯至在他的博士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问题原则》之中，将诺瓦利斯与其他浪漫派做了对比分析并概括了其使命：

诺瓦利斯既没有像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样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分裂，也没有像蒂克那样经历过巨大的幻灭。诺瓦利斯并没有囿于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浪漫主义的反讽，在当时的志同道合者中，他是一个使一切都统一和谐的纯粹诗人和独一无二的神秘主义者。^②

……

他的使命是构建一个原初的世界，对一切科学都追溯到最终同一性的源头，召唤黄金时代的到来，并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所有这一些皆依凭于他诗意的“心灵”的力量。诺瓦利斯的全部作品都交织和渗透着诗意，是诗意的想象和创造。因此，无论在形式的选择上，还是在内容的处理上，我们首先要把他的作品视为诗。^③

冯至对诺瓦利斯的核心观念“自然与精神的类比”的领悟，在他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十四行集》的诗作中得到了体现。这时冯至的生死观与其早年在《墓旁》、《秋战》、《最后一歌》等诗作中表现的将死亡看作是一种脱离苦海的方式的意识已有不同，此时的诗人已能够把死亡当作人生中的一次辞旧迎新，一个值得歌唱而又十分自然的过程来完成：

……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深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① 刘小枫著《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② 《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问题原则》，李永平、黄明嘉译，《冯至全集》第7卷，第9页。

③ 同上，第4页。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第2—14行)^①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② 秋日的树木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是为了舒开树身深入严冬，迎接春天；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是要羽化成蝶，以轻盈温婉的翅膀去点缀斑驳的阳光。冬去春来、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在新旧交替、循环往复中获得提升与永恒。

冯至从大自然中得到了启示，并由此认为人的生命也能够如同大自然一样获得永恒：“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而化成一脉默默青山的生命，显然能够与人、与自然、与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产生和谐与共融：

“我们并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③

条条路道道水，都有关联；阵阵风片片云，都有呼应。站在高山之巅、融入山川万物中的我们，也自然而然地与广袤而又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产生了关联与呼应，这人与自然相互融合、互相推进、共荣共生的场景深深地隐藏着一个根本的主题：“有限的夜露销残一般的个体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如何超逾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去把握时间的永恒的美的瞬间。”^④ 悉心体察，则能够悟出其中蕴含着的神学意趣，这意趣从一个方面彰显着基督教浪漫主义，它“既表达了灵性，亦充满了人情，它是神学的，但也是人道的、人本的，有着深深的人文关怀。”^⑤ 正因为如此，冯至尽管“在生命后期转向了杜甫、转向对浪漫派的否定，甚至由一个‘浪漫诗人’变成一个‘革命诗人’，精神内核发生了决定性的巨大变化”，但他形成于“1920年代的浪

① 冯至著《冯至代表作·十四行集》，第71—72页。

② 《圣经·诗篇》30：3—5

③ 冯至著《冯至代表作·十四行集》，第80页。

④ 刘小枫：《诗化哲学》，第11页。

⑤ 李枫著《诗人的神学》，第86页。

漫底色却始终如影相随。”^① 浸润于这样的人文情怀之中，我们能够领会：源自于“异域”的基督教浪漫主义何以能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诗人冯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能够自然而然地与之产生“共鸣”，将个人的所思所想表达为“沉思的诗”，并凝聚由小我通往“大的宇宙”的思想力量。当我们感受这力量并与之产生“共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虽不能指望一个人的诗作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神效，但我们还是能透过这样一种由信仰之光折射出的诗与思的相互交织，洞悉到一些端倪或线索，我们或能由此而开辟一条有助于人挣脱时代之困境的蹊径。由此，我们将不难理解海涅何以会说：“对于一个诗人，你们还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么？我们大家都是凡人，都要跨进坟墓，而把我们说过的话留在人间，等这些话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便回到上帝的胸中，这是汇集诗人话语的场所，是一切和声的故乡。”^②

更进一步分析，浪漫主义是变化发展的，“浪漫主义是去理解驱动你自己生命的各种力量，而不是遁隐于过时的事物。”^③ 由冯至早期诗作所体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浪漫主义的关联，亦能回溯出欧洲浪漫主义诗人与神学家们在构建其“诗化神学”时的一些追寻与思考，这样一种诗学与神学的共构，在英国近代基督教思想发展史上曾展现过其辉煌，在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发出了异彩，由此我们能够体会：神学不必局限于高堂讲章，只顾板着脸孔宣布深奥的理念或教义，让人们去亦步亦趋，顶礼膜拜。神学也完全可以以诗意之思去开启新的可能性，揭示新的存在方式。由此，冯至折射着基督教浪漫主义之光的代表性诗作，犹如黎明时分群山环抱中那宝石美玉般的静谧湖水衬托着的一池清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孤寂却卓尔不群，自有其沁人心脾、使人能够警醒并由此而获得启示的独特芬芳。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参见张辉：《1920年代：冯至与中德浪漫传统的关联》，载《国外文学》，2010年第3期。

② 海涅著《论浪漫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6-77页。

③ [英]以赛亚·柏林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